

晚明文学社群的交流与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张 涛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 要:征集与出版社稿是晚明文学社群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对文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社群为文人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交流平台,成为社群文人相互交流的媒介;社稿刊载社群文人作品,成为社群文人竞相阅读的对象。文学社群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大规模的社稿社集交流活动,促进了读者身份的转变,扩大了阅读群体。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而言具有独特性。

关键词:征集出版社稿;交流与传播;文学社群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62-06

一、征集出版社稿:文学社群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方式

晚明复社联合各地社群成立社群联盟之后,社群间扩大了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为政府培养出很多科举人才。但是,不同地域的社群组织皆希望自家能考中更多的进士举人,社群之间的竞争也就不可避免。哪家社群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举队伍,其中第社员就会增多。编选和出版社稿遂成为社群组织联络各地优秀人才加入社群进行文学交流的主要手段,其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发檄征文。就是社群以发布告示或寄信函的方式征集作品。较早发征文稿者可追溯至宋末元初吴渭所结“月泉吟社”。“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春向各地发文征集五、七言律诗,次年(1287年)正月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并将前六十名的诗汇为一卷刊行,名为《月泉吟社诗》。《月泉吟社诗》是最早通过发文征集的社稿。晚明通过发文征集社稿典型者当为复社。复社联盟于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后,在各地设分社,任命分社社长征集社稿,联络各地名人。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载,崇祯六年(1633年),复社举行虎丘大会前先散发信函,通知各地分社社长组织分社成员以文赴会。这种征文方

式最为直接,也最为方便,但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却与之不同,在征集社稿方式上尤不喜“出征文檄”^[1](《答杨淡云书》)。

搜集整理作者信息,便于社群交流联络。江西豫章社领袖陈大士言:“天子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科举选人不尽,以选贡收之。但是,取两京十三省选贡取进士却不知谁,互不通声气甚是遗憾,故由杨维斗诸子倡导,陈大士主持,各捐资若干,刻《合十五国选贡年谱》并序之。”^[2](《合十五国选贡年谱序》)《合十五国选贡年谱》实为社群成员之间的信息库,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人事档案,这样就有利于社群之间的往来交流与联络。复社《国表》之选,亦按省、府、州、县顺序记录社群成员名字,成为复社编辑刊刻社稿的重要信息来源。

社集征稿交流。这种征稿方式在元代早已有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当元之际,浙西岁有诗社,而濮市濮仲温丰于资,集一时名士,为聚桂文会,以卷赴者五百人,请杨廉夫评其优劣。”^[3](“唐荦”条)这是诗社通过社集文会征集社稿的最早记载。明崇祯九年(1636年),万寿祺开文社于金陵,数为大会,徐孚远参与社集并选刻《几社社会二集》^[4](《徐闇公先生年谱》)文学社群通过社集与各地文人士子保持紧密联系,社集文人成为社群编选社稿的主要队伍。

收稿日期:2013-09-08

作者简介:张涛(1973-),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派人到各地选文交流。复社《国表》之选除了以社集、发檄征文外,还由吴扶九出资,孙淳出面到各地征文,并到京师拜访贤良之士推荐稿件,《国表》之选名扬天下。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亦喜以“派人到各地征文”的方式编选社稿^[1],他还亲自挂帅到各地选文,如他说:“辛未(崇祯四年)七月自京师归郡城,十月既望,复自东乡历番阳、贵池至江宜,居两月而房选成。”^[1]《辛未房稿选序》他三次到吴地从事选文活动^[1]《戊辰房选千剑集序》。除此之外,复社评选家钱禧每刻社稿,也必派人到黄宗羲家请其评选^[5]《思旧录》。

编辑出版本社中第士子的文章进行交流。编选社群内中第士子文章,可以扩大本社文坛影响力,如艾南英《国门广因社序》曾记载“广因社”因编选社中中第士子文章而大盛:“戊辰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羣下者订交因社,是年中得曹允大为礼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而予罢归过济上,则圣邻行馆寓焉,圣邻方哀集社稿以纪盛事。”^[1]《国门广因社序》

文学社群编选社稿的方式与途径可谓多样,有些社群成员还把自己所作文章编选出版。艾南英就是一例,他把自己历年的科考试卷刻板付梓后,又取泰昌、天启改元后之应试之作刻为《后历试卷》^[1]《后历试卷自序》。

社群编选好社稿后还要刻板付梓,其方式主要有四种:(一)由社群诸子负责出版,如豫章社领袖陈际泰就曾委托复社刘伯宗为其刊刻古文集^[6]《大士之燕草序》。(二)文学社群组织出资出版,如于承祖《穀音集》就由明万历间芙蓉社所刻。(三)书商或者坊社出版,如几社陈子龙文章,在其中第前无人问津,中第后,书商争相刊刻。而艾南英更是书商竞相聘请的选家,由其评选的社稿被书商坊社出版后十分畅销。(四)由官府出版,如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一月一日,方密之与复社同人340人集于南京,请有司镂版付梓复社张自烈的社稿《删定四书大全》^[2](但官刻社稿还是比较少见)。社群所选社稿出版大致不外此四种方式。

文学社群编选社稿与坊社有很大关系,社稿的繁盛还受坊社书商的影响。明代统治者对出版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下令免除书籍税^[7]《卷26》,为私人刻书减轻了税收负担。而且,明代不像清代那样有严密的书禁,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明代在制造竹纸、皮纸等各种纸张的选料、配料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就使得民间坊

社非常发达,南京、苏州、湖州、徽州、杭州、北京、福建建阳等地都是书坊的集中地,南京、苏州的坊社最为繁盛,这就为社稿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坊社所刻书籍内容相当丰富,除了刊刻市民喜爱的戏曲、小说、时政等书籍外,还大量选刻畅销的八股文章。特别是晚明文学社群的大量兴起,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科举士子队伍迅速扩大,那些指导八股文写作的社稿社刻更受广大科举士子的欢迎,如由吴应箕所选复社《国表四集》刚出版,“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5]《思旧录》,可见当时社稿社刻是何等的畅销,社稿社刻成为坊社书商最为赚钱的出版书籍之一,以至那些出版商人为此“争先竞利”^[1]《四科盛业序》。坊社老板为赚钱便经常聘请社群评选家出面评选社稿社刻,如艾南英就言其“过金陵诸坊仍以房选见求”^[1]《再答杨惟节书》,崇祯三年(1630年)十月,南京的坊社书商更是亲自到安徽芜湖迎接艾南英,求其评选八股文集^[1]《庚午墨卷序》。文学社群通过坊社书商出版社稿既可以获得不菲的报酬,也可以促进社稿的畅销,达到扩大文学影响、传播文学思想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坊社与社群之间做了一个好买卖,郭绍虞先生因此说道:“正因为专研时艺的文社之多,所以,有些与书铺有关的‘坊社’请了一班制义名家,主持选政,揣摩风气,也会盛极一时。”^[8](P529)

二、提供场所与发表机会:社群影响文学的媒介性

明代初年,“三杨”和李东阳等台阁诗人主要以“兴趣”的相同结为文学团体,明成化、弘治以后,词臣文柄旁落,文学话语权力转向民间,门户意识增强,文学论争纷起,文人遂以“文学主张”的相同而结为文学社群^[9](P18~21),社群内文学讨论也多了起来,如谢榛在《四溟山人诗说》中就详细记载了“后七子”在社内的一次争论:

予客京师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吴明卿诸君招予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曰,诸君所向不同耳,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夸其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哀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云浊而归清,使李、杜诸公复起,以予为何如

也? 诸君笑而然之^[10](四溪山人诗话)。

由后七子这一社内交流来看,他们在诗法盛唐的文学复古思想上较为一致。但谢榛不主张从字句上“塑谪仙而画少陵”,他的这种观点在这次交流中得到了后七子社成员的一致肯定。结社活动使社员文学主张趋于一致,社群从而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交流场所。

郭绍虞先生言:“天启以后,怡老之会社不复举行,除纯粹诗社外,颇多专研时文之文社。”^[11](P569)以研讨时文为主要文学活动的社群是明万历以后兴起的一种社团类型,明启、祯之际达至鼎盛,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新景象。备考士子为科举功名而在一起尊师取友,社群就成为他们交流八股文法的重要场所,可谓“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骛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12](P171)。

要做好八股文,必须有深湛的经学基础。在社群内,成员交流最多的还是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经学著作。复社后期领袖李雯《诗经制艺序》就记载了几社成员在一起讨论经学的“热闹场景”:

是以几社之治《诗》者凡数十家,其尤绝者凡六七家。天下之经艺莫盛于《诗》,《诗》莫盛于今日之几社也。而余独以《尚书》孤立其间。观数子之操笔合作一经一纬,托物造意,临文命怀,艺成之后,抚叹盈堂,而予则独拍不调嗒然若丧。当此之时,未尝不恨高堂忧危,为尔寂寂也。夫专经之业,壮夫不道,然必有所党而乃有所纷争,有所纷争乃有所发明。今诸子合其所作,是非公之,各思雄长以诣巔极,可谓有先儒之风矣^[13](《诗经制艺序》)。

在李雯看来,学有所得乃是“有所纷争”的结果,“有所纷争乃有所发明”,因而,治学之道还是在于社员之间互通有无,交流各自治经的心得体会和经验。几社诸子大多同治《诗经》,社集时能“合其所作”,一起讨论“是非得失”,如此治学才能达到“巔极”。备考士子没有社群这个平台,他在科举竞争中很可能要走不少的弯路。河南雪苑社贾开宗也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曾七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中第,曾“作长歌云,‘自从廿载落魄馀,不信天上有魁星’,因大悟,尽焚其素所读书,闭户揣摩十余年,驰骛于先达师说十余年,最后而冥坐穷思与侯方域、徐作素往复辩论又几十年,卒归于正,以纯儒称之”^[14](《贾生传》),没有同社侯方域、徐作素与之几十年的辩论交流,也不会学有所成,被侯方域称为“纯儒”。

社群在平时进行科举交流活动,即使进京赶考,

也不忘结社交流科考信息。社群的这种交流平台功能可以说随时随地无处不在。这里我们举崇祯间浙江临海陈函辉^③所结“寒山社”为例。崇祯七年(1634年),陈函辉同寒山社社员进京考试,其诗《燕邸十五首》序说:“寓燕无他事,止有闭户读书与同人订交社耳。”^[15](《燕邸十五首》)陈函辉到京师后,为备科考专举社事,并与其它社群进行广泛交流,其诗《同龙友走访谭友夏、章爱发、钱彦林诸兄,各出近艺相示》即是明证。该诗是这样生动描写的:“户内牙签伴案青,雄文各自剖精灵。静心所照惟迟月,豪气难除亦迅雷。鵬鸢横空搏八极,蜃蛟戏彩起重溟。独怜十轴胡琴草,几掷金声与众听。”这首诗不仅记载了陈函辉同复社文学家谭元春、钱彦林等深入交流时文创作技法的情况,而且把这些创作经验称为“金声”,从中也流露出他们力争夺魁的豪情壮志。其另一首诗《第一场后同社叶具五、周翼生、应吉生、王五生、韩之孙谈场事,家仲孺亦至》也描述了他考完第一场后与同社成员交流考试状况的过程。该年会试,陈函辉中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文学社群为文学家提供了相互切磋交流的平台,他们中第的可能性才大大增强,文人士子能否中第和他们是否结社交流有很大关系。

文学家在社内日课时文外,兼课诗歌创作,表现出他们攻时文之余的社集雅致情怀。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陈函辉进京考试,“舟过齐鲁间,同社郭彦深偶拈九青韵见赠,订以社课之外,邮筒往还,不无可比,君时同行者十三人,而始终酬和不辍者予与彦深两人而已”^[15](黄光若《青未了小引》)。他在京城结社攻文外,也经常与同社成员雅集赋诗,其中就有很多著名的诗人,如竟陵派诗人谭元春、郑超宗、周粲甫、万年少、张尔唯等人,陈函辉《李小有招同谭友夏、韩雨公、郑超宗、程大来、李端木、周粲甫、万年少、张尔唯诸同社灯楼雅集》一诗就专门记载了他们诗酒唱和雅集情怀:“相将火树看银青,禁话时文只酒经。移到北山规晚节,占来东开聚繁星。燕秦楚越皆同调,憔悴支离有独醒。且喜谪仙留看月,惊人佳句带酣听。”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暂时摆脱科举功名,忘情诗酒宴饮的快乐之情。陈函辉还以“年”“评”为韵脚与社友往来唱和,商榷用韵之法,其往来唱和之诗亦以社名集,即《年评社集》^[15](《年评社集》)。

晚明不仅研讨八股文的文社广为盛行,纯粹之诗社亦异常活跃,不仅像辅国将军朱琯圻与琯垠、琯堉、琯堉诸人日课以诗的社群大量存在^[16](P779~780),

而且社内文学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中竹西续社仿元末月泉吟社^④结社征诗、编辑出版社稿进行诗歌交流就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崇祯十三年(1640年),竹西续社在扬州郑元勋“影园”牡丹花开时开展社集活动,《扬州府志》对此有详细记载:“于谿少有诗名,与郑元勋(超宗)、郑为虹(天玉)等结竹西续社。元勋影园开黄牡丹,远近征诗,以番禺黎遂球诗为第一,于谿为第二。”黎遂球,字美周,广东番禺人。数次入京赴考,途径吴越之地,与当地名士相唱和。崇祯十三年(1640年),再试京闱落选后游历扬州,正值郑元勋征“黄牡丹诗”,诗坛领袖钱谦益为“主考官”,黎遂球所作十首牡丹诗评为第一,被人誉为“牡丹状元”。此次社集征诗活动影响很大,黎遂球也因此而名扬四方。郑元勋亲自为他戴花披红,游街三日,可谓士林佳话。这种特殊的拈题远近征诗文学交流方式,与社内成员一时的诗酒雅集、拈韵赋诗不同,其交流的组织性和目的性增强。其后,“黄牡丹诗”经郑超宗编辑结集出版,显然受“文社”征集八股文方式影响,带有文社科举活动模式。除此之外,社群中还有云间几社六子“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17〕}(姚希孟,《周勒直诗选目序》)诗文双修方式,甚至社团成员之间书信来往“一月所积,或至一麓,积至数年,都无置处”^{〔18〕}(《题交游书牍手卷后》),可见社群间往来辩论交流非常之多。

社群成员的广泛交流往往容易导致文人文学观念发生转变,促使其创作走向成熟。社群成为文人创作观念转变的契机。据河南雪苑社领袖侯方域《楼山堂遗集序》、《与任王谷论文书》两文称,其十五岁时文学六朝,吴应箕告诉他当学韩、欧、苏三家,但侯方域“不知其善,亦不取视也。今知之欲与之言而吴子死久矣”^{〔14〕}(卷2,《楼山堂遗集序》)。又说:“仆十五岁时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名,每见必称佳。仆窃自喜。又得同学吴君伯裔日来逼索,尽日且酬和数首,以此得不废,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近得贾君开宗,徐君作素共相搓磨,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贾精于论,徐老于法,二君尝言,‘此系何等事,君不惨淡经营,便轻率命笔!’仆佩其言,不敢忘。足下当行文快意时,每一回思之,必赏此言之不谬也。”^{〔14〕}(卷3,《与任王谷论文书》)从这两篇文章中可知,侯方域由师法六朝,追求文章形式美,转向了师法唐宋,追求文章之神与法,由此“文章有分毫进益”,成为清初著名的古文三大家之一。侯方域文学成就的取得与复社吴应箕的指导和

同社吴伯裔、贾开宗、徐作素的“共相搓磨”有很大关系。再如复社宋尚木等人受几社领袖陈子龙诗歌创作思想的影响,陈子龙曾说宋尚木“早岁好为芳华绮丽之辞,一变而感慨激楚,再变而和平深婉,归之于忠爱。”又曰:“尚木为学最早,取裁亦最正。自吾论诗,诸子多悔其少作。”^{〔19〕}(《宋尚木抱真堂诗序》)

为促进更广泛的文学交流,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社群往往开展大规模的社集活动。社群成员以文赴集,在集会上讨论交流,把社集之文刻印出版。社群的这种社集活动既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广泛交流,又给社群文人提供了“发表作品”机会。吴应箕《国门广业序》对国门广业社的社集刻文过程记载甚详,可称一例:

自崇祯庚午秋,吾党士始合十百人为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响者逮之,称名考实,相聚以类,亦自然之理也。计其时为聚者三:主之者刘伯宗、许德先、沈昆铜也,癸酉则杨龙友、方密之,再一聚行,而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党自庚午后,从聚之士,半为升用,其本末固已见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为讳,而姚子独于忧疑满腹,谗口方张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党所先者道也,所急者谊也,所讲求者,异日之风烈事功。所借以通气类者,此文艺,而假以宣彼我之怀者,此觴聚也。今天子圣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举士为无用,吾党思所以仰副当宁之意,以间执谗慝之口者,则举视此聚耳,何畏哉?予闻其言而壮之。予因忆昌、启间正人一时向用,吉水诸公至于都门聚讲,而邪者掇击不遗余力。善乎福清有言,我国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党之聚,何敢自附前哲,然异己者不少矣。姚子独毅然行之,一无所畏,固为其难者哉。姚子乃哀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素为此聚之徒者,犹之聚者,于是并其文而广之,颜曰国门,总之不离乎聚者也。刻成,征序于予。予观姚子密识藻鉴,其所称道之文,必无不佳,此无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岂在是乎?故为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时之盛,因见姚子之独能为其难者如此^{〔18〕}(卷17)。

但是,晚明以研讨八股文之文社大量兴起并占据文坛主流地位,文社“功名”的导向作用使很多经生士子日日消磨于八股文中,诗歌创作反不受重视。与明代中叶前后七子诗派,以及晚明公安诗派相比,

此期诗坛创作日显衰落。即使有谭贞默创立的以挽救诗歌披靡为目的的驾社^⑤大力倡导诗歌创作,但社内“鲜知名士,故不久即烟消云散,为世所忘”^{[11](P570)},振起诗坛的文学重任旁落。虽然几社陈子龙、徐孚远、李雯等优秀诗人在社内相互唱和,诗坛出现复兴景象,但由于几社诗歌流派以恢复儒家诗教为理念,不惜蹈袭前后七子复古模拟老路,诗歌创作表现出强为“雅致”的呆板风格。再加以几社诗人明亡后多殉难,重振诗坛的希望化为泡影,终究还是未能改变晚明诗歌渐趋衰落的命运。明代中叶形成的文坛门户之争,在明代末年变本加厉,文学思想上的“唐宋派”与“秦汉派”之争仍然继续,社群之间由友好交流而变为一场文坛“谩骂”,这就失去了社群论争交流的实际意义。

三、文学社群促进读者身份转变,扩大了文学阅读群体

晚明文社联络来自各地的贤良之士,切实治学,认真研习八股文。文人借此不仅很快成名,而且在社群培养和推荐下很快中第,很多士子争相入社,人数也由明代初年的十人左右达到晚明的千人之多。如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领袖的东林社有六七百人,而据吴应箕《复社姓氏》记载及其孙的补录,复社成员则达到3013人。社集规模也更为宏大,仅就复社就有崇祯二年(1629)的尹山大会、崇祯三年(1630)的金陵大会和崇祯六年(1633)的虎丘大会三次大规模的社集活动。由于入社人数多,社集人数广,社群文学作品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文学作品的读者也由先前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学家而转向了众多的科考士子,在读者群体的身份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社群领袖或其他成员的中第,增强了社群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社稿的传播和社稿阅读群体的扩大。崇祯三年(1630年),几社文人陈子龙、彭宾、周立勋应南都试,陈、彭获隽,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此前“几社会义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隽,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20](P3)}。几社成员的中第使得几社名声大振,书商竞相刊刻他们的会试之文,社稿之刻屡兴不衰。据姚光所编《徐孚远年谱》载,崇祯十一年(1638年),徐孚远选刻《几社会义三集》,崇祯十二年(1639年),选刻《几社会义四集》,崇祯十四年(1641年),选刻《几社会义五集》^{[4](《徐闇公先生年谱》)}。

又据杜登春《社事始末》载,几社又有《六集》之刻,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社中文义选刻仍不辍,闇公先生亦自惊疑,故七集之刻委于徐子丽冲允贞、夏子升略维节,诗义之选则委之王子胜时,钱子子璧、张子处中三人”^{[4](《徐闇公先生年谱》)}。社群领袖与其他中第社员作品在社内社外争相传播,如豫章社领袖艾南英、陈际泰、章世淳、罗万藻四人以选文享誉各社,被称为“江右四大家”,四家文在“肆中”店铺广为流行^{[21](《题章大力稿》)},张采《大士之燕草序》就称陈际泰文集“凡缀文之士,人置一编,拟为方规,或几案间不备,即谓不可以道古”^{[6](《大士之燕草序》)},阅读群体可谓庞大。

文社科举的功利性,使得书商与文社联合选文,出版社稿,社稿作者与作品数量相应增多。元代已有浙西濮市濮仲温举办“聚桂文会”,“以卷赴者五百人”^{[3](P42~43)}。而到晚明,社稿刊登社员的作品更多,仅复社张溥所刻社稿《国表》就达十余省,七百余人,文两千五百余篇,被陆世仪称为“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也”,“从来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閤书贾由之致富”^{[12](P204)}。几社社稿则不限于编选时文之稿,而是“兼为诗古文辞”^{[4](《徐孚远年谱》)},“崇祯五年……有《几社会义初刻》、《壬申文选》、《几社六子诗刻》,几社由六人渐广至百人”^{[4](《徐孚远年谱》)}。大规模的社集活动也同样扩大了社稿作者和作品数量,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秀水姚瀚“英年乐于取友,尽收质库所有私钱,载酒征歌,大会复社同人于秦淮河上,几两千人”^{[3](P661)},聚其文为社稿《国门广业》。当时阮大铖所创《燕子笺传奇》盛行南京,复社社集之日,南京处处停演赶赴复社集会,把戏剧“读者”吸引到社集中来,扩大了读者群体,姚瀚《秦淮即事》诗即盛赞此事曰:“柳岸花溪澹沱天,恣携红袖放灯船。梨园子弟觐人意,队队停歌燕子笺。”^{[3](P661)}

总之,社稿既刊登社员作品,又是社员阅读对象,既以社集汇文,又以社稿慧人,从而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实现了作者与读者的一体化,其影响力甚至波及“海外”。据全祖望《徐都御使传》载,徐孚远在台湾结海外几社,台人“争从之游”,社稿编为《海外几社集》^[4]。文学社群对文学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注 释:

- ① 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言其安排选文人选:南昌为士云、士业,吉安为可上,虔州以南为杨淡云。(艾南英《天佣子集》清道光重刻本)
- ② 参见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张自烈《芭山文集》卷三《旅记·四》对此也有记载。
- ③ 据清代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五《列传二》记载,陈函辉(1590—1646),字木叔,号寒山,临海人,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授靖江知县。
- ④ 月泉吟社对后世影响很大,《辞源》就收入了“月泉吟社”条,对月泉吟社的征诗过程记载颇为详细:“月泉吟社,宋元后遗民所立诗社名。浦江吴渭,字清翁,号潜斋。宋时为义乌县令。入

元后退居吴溪,立月泉吟社。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主持社事。至元二十三年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五、七言律诗,次年正月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并将前六十名的诗汇为一卷刊行,即名《月泉吟社诗》。”不仅如此,月泉吟社还仿科举糊名考校例品评所征诗歌,既先以别名标记,再于其下方署其真名,进行点评(详阅吴渭所编《月泉吟社诗》,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⑤ 沈季友《樵李诗系》(卷二十)云:“当天、启间,风雅衰落,经生有不知四声者,贞默创立驾社,集里中诸名士,岁时征咏,共相切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参考文献:

- [1] 艾南英. 天佣子集[M]. 清道光重刻本.
- [2] 陈大士. 己吾集[M]. 台北:台湾伟文书局出版有限公司,1977.
- [3]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 [4] 徐孚远. 钓璜堂存稿[M]. 金山姚氏怀旧楼刻本,民国15年(1926年).
- [5]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 [6] 张采. 知畏堂文存[M]. 四库禁毁书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7] 龙文彬. 明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8] 郭绍虞.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9]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10] 陈允衡. 爱琴馆诗慰[M]. 毗陵董氏刻本,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 [11] 郭绍虞.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2] 陆世仪. 复社纪略[M]. 上海:上海书店,1982.
- [13] 李雯. 蓼斋集[M]. 四库禁毁书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4] 侯方域. 壮悔堂文集[M]. 续修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5] 陈函辉. 小寒子集[M]. 明崇祯刻本.
- [16]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7] 陈允衡. 诗慰初集二十家[M]. 清顺治澄怀阁刻本.
- [18] 吴应箕. 楼山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9] 吴梅村. 吴梅村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0] 杜登春. 社事始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1] 俞长城. 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M]. 文盛堂、怀德堂本,清乾隆三年(1738年).

Literary association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ANG Tao

(Hebei Academic Journal,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hat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s act as a platform for swapping with their collections and wor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influential for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Members may readily have their own works publicized, and also get access to the works by others. Likewise, the literary associations spread eventually overseas, combining readers and writers alike.

Key words: collection; swapping; literary association

[责任编辑 吴继章]